

河池壮族铜鼓习俗

HECHI ZHUANGZU TONGGU XISU

主编 吴才泽



广西人民出版社

河池壮族铜鼓习俗

HECHI ZHUANGZU TONGGU XISU

主编 吴才泽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河池壮族铜鼓习俗 / 吴才泽主编. — 南宁 : 广西
人民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219-10239-8

I. ①河… II. ①吴… III. ①壮族—铜鼓—介绍—河池
IV. ① K8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8074 号

责任编辑 韦洁琳
助理编辑 邓 韬
责任校对 黄丽莹
封面设计 韦秋宇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印 刷 南宁市开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26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3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10239-8

定 价 8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 委 会

编委主任：杨卫群

副 主 任：黄英儒 饶永恒 吴才泽

成 员：韦东平 韦克俭 牙 彬 韦英华

潘 湖 陆世许

主 编：吴才泽

执行主编：黄恒泽

编 辑：梁富林 陈恒芳

韦土良 梁世甲

编 务：韦 杨 韦小娟 谭安强 许 政



【前言】

河池，是世界铜鼓之乡，自汉代以来，铜鼓文化世代沿袭。

铜鼓，是河池壮民族的心灵圣殿，是骆越文化的经典传承。

漫长的历史文明创造了河池灿烂的铜鼓文化，也创造了铜鼓文化完整意义上的知识系统和价值系统。这个系统，体现在壮民族仪式般的日常生活和如歌如诉般的日常话语中。民间有多大，它的系统就有多大。人们往往一谈到铜鼓，就有一种超凡越俗的自豪感，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将铜鼓有效的运用和创造！

人类文明的历史常常有这样错位：当我们意识到某种文明的重要性的时候，这种文明已经死去或者正岌岌可危。面对着迅猛发展的信息时代，面对着全球化的汹涌涛声，我们数千年来创造的整体意义上的民间非物质文化可能将被席卷而去。铜鼓文化同样如此。人们富裕着，但也贫穷着。他们发现历史的不完整性，发现缺少了老百姓纷繁生活的历史是不完整的历史，于是就有了诸如河池壮民族对铜鼓一类文化艰难的守候，有了对铜鼓习俗不懈的追求和传承。

我们常常为铜鼓生生不息的活力感动：河池是革命老区，是经过血洗的河山。当血腥过后，老百姓的日子竟仍能井然有序地进行，生儿育女，婚嫁习俗，节典村风，



喜迎吉拜，送终殡葬，一个环节都不缺少，铜鼓的旋律更是永远不会忘却。这究竟是什么力量使然？

更令人感动的是，河池的铜鼓也历经苦难，只有历代黎民的护救，才使铜鼓在历史的凤凰涅槃中得以再生。就像一个日月经天般的人物从高堂坠落民间，像一个龙心虎胆般的英雄退入田垄，然后又怎么医治好委顿的意志和滴血的伤痛，最终再次跃入历史的天空，使铜鼓的物与神世代不灭！

在冥冥的思索中我们知道：河池壮民族虔诚地守候着一份神圣的民间快乐，他们通过铜鼓那亘古的声响和撼世的力道，千百年向世界传递其不朽的民族之声，使壮族阳世的威严与尊贵不朽。目前，河池民间藏鼓 1400 多面，几乎与全国馆藏铜鼓的总量相等。为什么偌大世界，铜鼓这灵气十足的古董却偏爱这么个多情的河池壮族民间？为什么西洋乐器所具有的热烈和疯狂，都无法湮没这方水土流淌的金属之声？那是因为，它不仅仅以物的威严存在，更以情的丰富流传，是壮家人的精神冶炼，使铜鼓被升华到了神圣的境界。因而，铜鼓也就成为全面综合地方社会生活的文化核心，成为壮民族不可磨灭的文化符号。

在河池壮族民间，铜鼓已远远超越物的崇拜，它是人们心中隆起的精神高原。千万年远祖的背影已融入历史风烟，岁月镌刻在山洞石壁上的一道道年轮也已漫漶莫辨，但文化创造的历史惯性还是凭借着生生不息的这方先民，震颤着我们脚下的地球广域。壮族铜鼓文化习俗，是典藏的文化，是壮民族为世界承先启后创造的巨大财富，河池壮族千万年搭建的铜鼓平台，愉悦的是一方百姓，展示的是民族风采，激荡的是世界风云。

铜鼓，不是孤立的金属硬件，由它演绎派生的铜鼓文化习俗丰富多彩。如三月三歌节，蚂蛳节；又如春柳舞，猴鼓舞等，都是与铜鼓并存的民族民间文化。铜鼓文化有许多浪漫的传说，充满着理想主义的光辉与魅力。在壮民族的话语里生动活泼了千万年关于铜鼓的民间传说，就是



历史的另一种真实的回声。它深刻地表达了老百姓对社会、对人生、对忠奸贤愚、对善恶美丑的真实态度和理想愿望。它不是史书，也不追求史书的貌似公允。它似乎是信口说来，了无挂碍，却抓住生活意象的某一侧面，直指事情的本质面貌。即便是那些纯属虚构的传说故事也可给人以真实可信的感觉。经过漫长岁月的无情淘洗，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激情演绎，关于铜鼓的传说常常焕发出精金美玉般的光彩和质地，顽强地表达着民间的声音和心理。因为有了这些传说，才有了铜鼓的神奇与丰富，这是铜鼓传说的价值和意义。

岁岁相沿的铜鼓故事在亦真亦幻的旋舞中浅吟低唱。她楚楚动人，本色不变，风采依然；她娓娓动听，摄人魂魄，撩人心弦。无论是实有其人的鼓鸣鼓舞，还是子虚乌有的鼓闹龙宫，人物传说神韵十足，意味深长；与铜鼓息息相关的《布洛陀》《文龙与小妮》《达研与日驾》等极富诗意的创世故事和爱情传说，更是脍炙人口，深入人心。

对壮民族而言，本书该为经典。所谓经者，书也；典者，范也。经典者，可为典范之经书也！民间文化，绝多无载！之所以称之为经典，皆因其数千年垂范世间，人共效法，实为民间的不经之典！能把历史失落的东西捡起并典藏，能为此竭尽绵薄之力成就一典，真可谓三生有幸！天高云淡，日丽风和，该是胸中激荡着平静的时候了。不要指责牢骚，不要顾影自怜，所要的只是睡梦中也睁着一只眼睛的文化警觉和忍痛不响的艰辛劳作。这是我们的理想，也是我们的责任，愿与关注非遗文化特别是铜鼓文化的朋友们共勉！

该书整体上以记录性的文字撰写，致力还原事物真实的原始面目，追求叙述事件过程的完整性。由于涉面广泛，时间跨度大，知识性强，借鉴的文史匮乏，因而很难如愿以偿。不足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委会

2016年冬



目 录

第一章	河池壮族铜鼓习俗的历史与发现·····	009
一、	从地名看河池壮族铜鼓习俗的历史·····	011
二、	从出土铜鼓看河池壮族铜鼓习俗的历史·····	012
三、	河池壮族铜鼓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013
第二章	河池壮族铜鼓习俗的分布·····	017
第三章	河池壮族铜鼓习俗中使用的铜鼓类型·····	046
一、	冷水冲型·····	047
二、	遵义型·····	049
三、	麻江型·····	050
第四章	河池壮族铜鼓习俗呈现的独特功能·····	064
一、	喜庆功能·····	065
二、	娱乐功能·····	066
三、	权力功能·····	068
四、	财富功能·····	070
五、	审美功能·····	072
六、	集众功能·····	076
七、	娱神镇邪功能·····	078



第五章 河池壮族铜鼓习俗的文化演绎·····	083
一、普天同庆·春节·····	084
二、风调雨顺·蚂蛳节·····	086
三、五彩绣球·歌圩节·····	088
四、天牛下凡·牛魂节·····	090
第六章 河池壮族铜鼓习俗的艺术载体·····	092
一、铜鼓音乐·····	094
二、铜鼓音乐的基本构成·····	095
三、铜鼓音色的构成·····	096
四、铜鼓音乐的节奏·····	096
五、铜鼓的演奏方法·····	097
六、壮族铜鼓与壮族舞蹈·····	108
第七章 河池壮族铜鼓习俗的传奇故事·····	151
一、有关铜鼓的神话传说·····	152
二、有关铜鼓的民间故事·····	173
第八章 河池壮族铜鼓习俗的保护与传承·····	189
一、河池壮族铜鼓习俗保护相关政策、法律法规·····	190
二、河池壮族铜鼓的国内外影响·····	191
三、河池壮族铜鼓收藏方式及规模·····	207
四、铜鼓普查·····	207
五、铜鼓铸造技艺·····	208
六、音乐铜鼓研发·····	213
七、铜鼓文化研讨·····	216
八、铜鼓习俗的活态传承·····	216
九、铜鼓习俗传承人简介·····	218
后 记·····	223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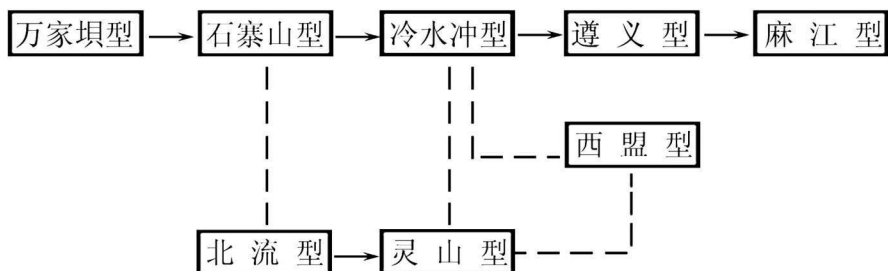
河池壮族铜鼓习俗的历史与发现





铜鼓是我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及东南亚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它是娱乐中的乐器，是礼神时的礼器，更是权力重器，是地位与财富的象征。

铜鼓约于春秋中早期产生于我国云南中部偏西的楚雄、祥云、弥渡一带，之后沿着巨川大河向东、南、北三个方向发展：向北进入川、黔、湘等地，向东进入两广，向南进入越南等东南亚各国。在流布过程中不断与各地文化相融合，形成各自的风格。根据铜鼓在各地出现的时间及不同的风格，学术界将古代铜鼓划分为万家坝、石寨山、冷水冲、遵义、麻江、北流、灵山、西盟等八大类型，它们的相互关系如下。



根据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中国古代铜鼓》一书（文物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各类型铜鼓的年代为：

万家坝型：出现于春秋早期至战国早期，前后延续约三、四百年；

石寨山型：约战国至东汉，前后五百余年；

冷水冲型：约西汉中期至隋唐，前后一千年左右；

遵义型：唐代至宋代，前后六百年左右；

麻江型：南宋末至清末，前后约八百年；

北流型：西汉中、早期至南朝末；

灵山型：东汉末至唐代中期；

西盟型：唐代至近代。

河池是我国古代铜鼓的重要分布地区。

河池位于广西西北部，当黔桂要衢。境内居住着壮、汉、瑶、苗、侗、水、仡佬、毛南等8个主要民族，其中壮族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67.45%。铜鼓文化流布的重要通道——红水河经贵州西南部进入河池，自北向南穿越河池西部七县，为境内第一大河。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使得西南夷文化、百越文



明很早以来即于此地交汇融合，因而河池壮族铜鼓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

一、从地名看河池壮族铜鼓习俗的历史

河池有不少以铜鼓为名的地名，仅据宜山县（今宜州市）地名委员会1983年编辑出版的《宜山地名集》，宜州市即有以下几处。

宜州城东约2公里有一小歇村，村头小溪上有一座石拱桥，名曰“铜鼓桥”（图1）；



（图1）小歇村铜鼓桥

宜州市矮山乡鹏岭村（现属庆远镇）村前小河上有一石拱桥，亦名为“铜鼓桥”（图2）；



（图2）鹏岭村铜鼓桥

宜州市矮山乡六桥村公所辖区内有一屯名为“铜鼓村”（图3）。此村村后约1.5公里处有一片耕地上百亩，其中有一块地名为“铜鼓地”（图4）。

此外，其他文献还记载：

河池三旺里有铜鼓潭。传说曾“有铜鼓自潭内逐水涌出，村人获而击之”，故将此潭命名铜鼓潭（黄祖瑜修、黎德宣纂《河池县志》卷二，14页）；



（图3）铜鼓村



（图4）铜鼓村后的铜鼓地（箭头指处）



宜州有铜鼓岩。清“道光五年，宜邑龙门司（今宜州市北牙乡境）交椅村民在铜鼓岩前田内掘得一铜鼓，重一百六十斤，太平圩人争购，经宜山县断，令舁至神庙安置，以留古迹”（清·英秀总纂、唐仁编纂《庆远府志》卷三、14页）；

罗城四把镇有铜鼓山，得名于山下水击声如铜鼓（杨家珍总纂《天河县乡土志》90页）；

东兰县大同乡扳那屯有铜鼓岩，因岩内钟乳石敲击声如同铜鼓声而得名（《河池铜鼓》绪言第8页，吴伟峰等主编）；

宜山有铜鼓泉（覃祖烈总纂《宜山县志》卷一、90页）。

以上地名产生自何时，至今均无法考证，当地村民都不知道这些名称的来历及产生时间。如矮山乡（今庆远镇）六桥村公所辖下的铜鼓村，该村2004年有108户、人口410多人。村民有莫、梁、潘、张等姓，其中居住时间最早的为莫姓及梁姓，至今有20余代。按25年为一代计，铜鼓村梁莫二姓到该地居住已有近600年历史。该村现今年纪最大老人的已有90多岁，对“铜鼓村”“铜鼓地”的来历，这些老人都不知道，说“从没听到老人讲过”，可见这些地名产生年代的久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地名的产生肯定与当时这一带的铜鼓有关，这也从后来这些地方陆续出土的铜鼓得到了证明。

二、从出土铜鼓看河池壮族铜鼓习俗的历史

《庆远府志》载宜邑龙门司交椅村出土铜鼓之事，是有关河池铜鼓出土的最早记载。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卷七所言：“广西土中铜鼓，耕者屡得之。”河池也应是如此，只是由于各种原因，人们未能掌握全部信息。交椅村出土的铜鼓现已不知去向，目前已知的河池出土铜鼓共有7面，分别是：

1977年春，宜州市矮山乡良山冲村出土一面铜鼓，鼓面、鼓足直径均为66.5厘米、高44.5厘米，鼓面边沿有4只青蛙塑像。此鼓后为宜州市文物管理所收藏，经鉴定，为冷水冲型铜鼓。

1978年春，前述宜州市矮山乡铜鼓村莫瑞兰、莫少文、杨茂文3位村民受生产队安排，到该村那块“铜鼓地”犁地时，犁出一面大铜鼓。当时是白天，他们害怕被别人发现，便将鼓重新掩埋，当晚3人去把铜鼓挖出，并把鼓身打烂作废铜卖给供销社，鼓面因花纹好看而被留下来，80年代中期被一个南宁人买走。据他们回忆，该鼓鼓面直径60厘米—70厘米，上面立有四个青蛙。



此鼓亦应属冷水冲型。

1993年3月,宜州市洛西镇洛西村果路屯一村民在该屯山上发现一面铜鼓,此鼓既大且重,于是该村民将鼓从山上慢慢滚下拿回家中。几天后,宜州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闻讯赶去调查,该村民说铜鼓已被人买走。从他说“鼓面像桌面那样大,上面有4只蚂蚁,中间的太阳有13个角”看,此鼓也应是冷水冲型铜鼓。

2000年7月,宜州市怀远镇叶茂村冲英屯村民潘立敏在取土建其父坟墓时发现一大一小两面铜鼓,小鼓套在大鼓之中。此二鼓现藏宜州市文物管理所,大鼓面径49.5厘米、足径56厘米、高32厘米;小鼓面径33厘米、足径40厘米、高24.5厘米。经鉴定,二鼓均为冷水冲早期鼓。

2007年,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东兴镇一砖厂在挖泥制砖时,挖到一面铜鼓,此鼓现为广西区博物馆收藏,为冷水冲型。

2008年,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东兴镇一居民在该镇前的中州河中发现一面铜鼓,据发现者介绍,铜鼓鼓面宽大,上面有4只青蛙塑像,应是冷水冲型。后来此鼓下落不明。

据《中国古代铜》一书(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1988年10月文物出版社出版)考证,冷水冲型铜鼓的流行年代为西汉中晚期至唐代,使用人群是当时的僚人。河池这些冷水冲型铜鼓的出土说明,至迟在西汉(前206—前8)晚期,居住在河池一带的壮族先民——僚人就已经使用了铜鼓。自那以来的两千多年间,铜鼓在这一带代代繁衍,生生不息,成就了博大精深的河池铜鼓文化。

三、河池壮族铜鼓文化的发现与研究^①

尽管自西汉晚期起河池壮族先民就已经使用铜鼓,铜鼓文化这棵大树在河池根深叶茂,但由于地处岭南西鄙,山高壑深,交通闭塞,长期处于“蛮荒之地”,文人士大夫极少涉足其间。致使使用铜鼓等风土民情在史籍上鲜有记载,外界对河池壮族铜鼓知之甚少。最早明确记载河池壮族铜鼓的是《宋史》,该书卷四九四《蛮夷列传二》记载,北宋淳化元年(990年),南丹州刺史莫洪膺卒,其弟莫洪皓袭称刺史,为求得宋王朝的认可,派遣他的儿子

注:①此节主要参考《河池铜鼓》(吴伟峰等主编·广西民族出版社·2009年)



莫淮通向宋王朝进贡方物，贡品中有银碗二十、铜鼓三面。

《宋史》卷四九五《蛮夷列传三》在关于抚水蛮（其地含今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境》的记载中则说到了这一地区壮族先民铸造及使用铜鼓的习俗：“诸蛮族类不一……其族铸铜为大鼓，初成，悬庭中，置酒以招同类，争以金银为大钗叩鼓，去则以钗遗主人。相攻击，鸣鼓以集众，号有鼓者为都老，众推服之。”

元明二代，这一地区铜鼓习俗未见记载，直到清代以后，这一地区壮族使用铜鼓的习俗才逐渐为文人所关注。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庆远府知府李文琰主修《庆远府志》，在卷十《杂志类》“琐言”中写道“瑶壮俱尚铜鼓，而所用之时不同，有用之于吉礼，有用之于凶礼。南丹惟丧事用之，犹须卜日，可击则击，不可击则止。”

清道光八年（1828年），庆远府知府英秀重修《庆远府志》在卷三第14页中，除照抄前志这段记录，还介绍宜邑龙门司交椅村民于铜鼓岩前田中掘得铜鼓之事，这是有关河池出土铜鼓的最早记载。

民国八年（1919年），黄祖瑜督修、黎德宣总纂的《河池县志》卷一第34页记载：“地方多古代铜鼓，凡遇年节及有婚丧事等，皆击铜鼓，并挝革鼓以和之。”

20世纪30年代，旅行家田曙岚到东兰考察过“埋蛙婆”的习俗，在随后出版的《广西旅行记》中介绍这一习俗时说：“男女共集于一定场合，轮班击铜鼓，唱歌作乐。”

1935年，黄芝冈在上海《太白半月刊》发表《说铜鼓》一文，特别对东兰新年使用铜鼓的情况进行叙述：“东兰新年，各村高悬铜鼓，日夜敲打。鼓是以几具作一组的，敲鼓的是童子，左手用小木条敲鼓面的边沿，右手用缚着碎布的槌敲鼓的中心。丁东铿锵，此敲彼应，极尽音声之妙。”

20世纪30年代，民族学家徐松石深入河池各地考察，在其1938年出版的《粤江流域人民史》中记载他在宜山县（今宜州市）访友人蒙增英时，蒙告诉他，宜山青塘有一人善打铜鼓，打鼓一声，家人锄地一下。种苞谷和耕地时，甚有用处。由此可见面礼，这一带壮族往往以打铜鼓来调节工作时的劳苦。

新中国建立后，河池铜鼓受到越来越多的文物、民族工作者的关注。



1956年和1958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等部门组织队伍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进行调查,调查地区中就有河池南丹县。在《南丹县大瑶寨社会历史调查》和《南丹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均提到民间铜鼓,遗憾的是只提到瑶族和苗族,而没有壮族。

河池市文物管理站梁富林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逐步开展对红水河流域铜鼓的专题调查,如1989年的东兰县民间铜鼓调查、1991—1993年的河池地区民间传世铜鼓调查等。之后,一些有关河池铜鼓习俗的调查报告及论文相继发表。1990年,梁富林、韦云生在《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第七期发表《广西东兰传世铜鼓多》一文,介绍了东兰县民间铜鼓的收藏情况;1993年李楚荣在《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第九期发表《麻江型铜鼓制造问题刍议》,根据河池一些传世铜鼓上的“独山双和号”“希吕氏记”印章,推断明清时期在黔桂边境应有专门制造铜鼓的手工作坊;1994年7月7日,庞革平在《中国青年报》第5版发表调查报告《流失流失,河池铜鼓声咽》,报道了河池民间铜鼓的收藏及保护现状。根据受访者之一梁富林的建议,庞在文章中将河池称为“世界铜鼓之乡”,这是河池“世界铜鼓之乡”一名首次在我国主流媒体上出现;1995年梁富林在《民族研究动态》1995年第二期发表《河池传世铜鼓调查及其它》一文,第一次较为全面地向世人介绍了河池传世铜鼓的数量、类型、分布、族属、权属、来源及使用等情况,同时还在《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第十一期发表《河池传世铜鼓的特殊纹饰》,介绍河池铜鼓上一些特殊纹饰和印记;2000年梁富林在《广西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发表《河池传世铜鼓的“神器”功能》,从功能角度研究河池铜鼓,认为河池地区的壮族及其他使用铜鼓的民族将铜鼓奉为神器,笃信铜鼓是神赐之物,具有神奇的本领,是酬神驱鬼、祛灾纳吉的神圣之器,总是在最隆重的祭祀场合中使用。2000年9月,在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召开的红水河文化研讨会上,红水河铜鼓调查课题组宣读《河池地区红水河流域传世铜鼓调查报告》,对河池地区红水河流域传世铜鼓的数量、类型、分布、来源、作用及与铜鼓有关的习俗作了简要介绍。

2003年,广西民族学院(现广西民族大学)万辅彬教授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申请“麻江型铜鼓振动模式的调音机理研究”项目,研究地点重点定在河池。他带领研究生深入壮乡瑶寨考察,写出《河池壮族铜鼓演奏的律性



倾向考》等论文，从声学角度对河池壮族铜鼓进行研究。

在这期间，法国、日本、泰国、澳大利亚等国和我国台湾、香港地区从事民族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都曾深入河池，对壮族民间铜鼓进行考察。

1991年2月，日本立教大学、弘前大学和福岛女子短期大学与广西民族研究所的学者合作，专程到东兰兰阳考察壮族蚂蛭节使用铜鼓的习俗，发表《中国广西东兰县兰阳村壮族蚂蛭节调查报告》。

1996年2月，法国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与印度支那半岛人类学研究中心大理安派博士一行前往东兰作人类学专题考察。

1996年2—4月，我国台湾刘客养深入东兰长江乡巴英、兰阳、板登等壮族村寨考察壮族铜鼓，写出《壮族铜鼓音响研究》一文，从音乐角度进行“视铜鼓为乐器”为主的研究，以音响为主要研究方向，填补了铜鼓研究中的一个空白。

通过上述文章的陆续发表，河池民间铜鼓的真实面目逐渐为世人所知。



铜鼓筒嘞舞